

Series of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当代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丛书

Editor-in-Chief of SSSS: ZHENG Bingwen

丛书主编/郑秉文

The Welfar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

SSSS

[加] R·米什拉

Ramesh Mishra

郑秉文 译

Translator

ZHENG Bingwen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CHINA

《当代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解放军总后勤部,有关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其他单位从事社会保障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近100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共同完成。

《丛书》由12部著作和6部译著组成。著作各册运用规范和实证分析的方法,较系统地阐述了国外社会保障理论的诸多体系,分析了世界上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国家和地区社会保障模式的形成演进、历史作用、面临的问题与改革的走向,并对建设和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探讨。6部译著均系国外福利国家理论研究领域的经典名著。

《丛书》对政府有关政策研究部门和实际工作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亦可作为有关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研究生、本科生的参考教材。

The SSSS (Series of Social Security Studies),the first huge collection ever published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in China,has been completed following three years of work by nearly 100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the 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the General Logistics Department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relative research institutes,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and other units.They are engaged in the theoretical study and pragmatic work related to social security.

The SSSS consists of 12 volumes of works and six volumes of translated works.Using the method of both normative and positive analyses,the authors systematically expound multiple schools of the theories on welfare state in the world,and,the formation,evolution and historical role of social security modes of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s considered representative in the world,and also the problems facing them in this regard and the trends of the reform.They als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and perfection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The six volumes of translated works are all elaborately selected from the huge catalogue of renowned works of welfare states.

The SSSS is considered of the value of reference of related government policy makers and officials doing practical work.It can also be used as reference textbooks by related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post-graduates and undergraduates of relative major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独角兽工作室

平面设计

ISBN 7-5036-4525-3



9 787503 645259

ISBN 7-5036-4525-3/D · 4243 定价:20.00元

Series of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当代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丛书

Editor-in-Chief of SSSS : ZHENG Bingwen

丛书主编/郑秉文

The Welfar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

[加] R·米什拉

Ramesh Mishra

郑秉文 译

Translator

ZHENG Bingwen



法律出版社

导 论

自从第一次石油价格震荡产生通货膨胀并在西方导致了“滞胀”这一新经济现象以来,15年多已过去了。第一届新保守主义政府在英国上台执政也已10年多了。他们是在抛弃关于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的战后共识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当选的。当我们迈入90年代之际,英国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政权仍在执政。然而,与多数左派所害怕的及多数右派(或许还有极左派)所希望的相反,福利国家并没有被新保守主义者摧毁。尽管开始出现裂缝,保养费和维持费却一直是处于最低限度,家具虽开始变得破旧,但建筑的大部分仍完好无损。在事情的另一端,瑞典社会民主党仍在台上,像过去一样坚持充分就业的社会福利政策。并且,与极左派和右派的期望相反,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妥协一直未受到动摇。对于在瑞典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中正在实施的“合作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来说,就更是如此。而且,对占主导地位的支持普遍公益的舆论在所有西方国家中更显强烈。这表明了舆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增强了对于福利国家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进程这一观念的信任。那么,我们将如何解释70年代中期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中出现的“危机”呢?暴风雨已经平息了吗?我们再一次航行在平静的水面上了吗?就社会福利而论,是否与从前一样对未来的期望也很谨慎呢?如果不是,那么什么发生了变化?当我们进入90年代时福利国家的状况又如何呢?

本书试图回答这些公认而庞大的问题。简单地说,福利国家

最近的历史可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危机”(1973年前)，“危机”(70年代中期和后期)、以及“后危机”(1980年及以后)时期。“前危机”阶段由相对稳定的凯恩斯—贝弗里奇范式(Keynes-Beveridge paradigm)所代表。在“危机”阶段，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作为范式的可信度急剧下降，新保守主义开始出现。“后危机”阶段以新保守主义政府的当选开始，它们发誓要放弃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目标和方法。“后危机”阶段因此似乎是一个在社会福利政策上和意识形态上分歧不断扩大的时期，尽管主要趋向是向右转。新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合作主义(social-democratic corporatism)看来对70年代福利资本主义的困境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前者谋求收缩福利国家，后者则试图保护它。但是，这两种回应主要是在其政治意识形态和言论上不同，还是在政策和结果上也有很大不同呢？本书给出的答案是后者，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权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集团，他们与主要的阶级集团—资本和劳动力—具有关联性。简言之，政策、价值和社会后果的根本性问题都与此有关系。通俗地讲，这两种类型的政权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局限性：社会福利的当代戏剧已经过时了。这是我在《危机中的福利国家》(The Welfare States in Crisis)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的继续。那本书把新保守主义的崛起看做是来自右派的回应，而把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合作主义的“整合”方法视做是对左派的有效回应。现在这本书将仔细考察这两种政策模式在实践中运行的详细情况，因此它可以被看做是《危机中的福利国家》的续篇。

第一章概括地描述了1973年以后时期中新保守主义的出现和社会民主合作主义的回应，它们分别代表着福利国家的收缩派和维持派。这一章还从理论的角度概括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其中涉及到阶级、危机、意识形态和政策观念等。第二章考察了美英两国收缩战略的行动，并根据一些数据的推论，提出了福利国家的出

现已不可逆转的论断。第三章总结了在瑞典和奥地利这两个国家中实施维持战略的过程,并突出讨论了这些国家与新保守主义政权之间在政策及其结果上的区别。这一章还简要考察了左派反对社会合作主义(social corporatism)的种种批评,尤其是那些对偏袒组织生产者利益的批评。第四章考察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近年来各自谋求效仿新右派和社会合作主义的战略。这章的目的是在传统的英国、美国、瑞典和奥地利的案例之外,扩展这两种方法的运作所能获得的证据的范围。第五章对国别的研究成果给予了总结,对全书的主要论点带有总结的性质。根据前几章中提出的论断和证据,这一章对福利国家的一些主要解释进行了批判性的回顾。最后,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福利当前的发展,这一章提出了新的分析角度。

第一章 战后共识的结束:收缩和维持的战略

战后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或多或少对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形成了赞同的共识,但在 70 年代,这种“战后共识”却受到了严重削弱。共识瓦解的原因主要是“物质”的,而非“思想”的。的确,从 60 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右翼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就开始贬低“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改革,培育对社会工程本身的幻灭感。^①更为普遍的是,新保守主义哲学家开始提出最小国家的思想,以反对罗尔斯(Rawls)关于社会正义的自由主义思想,因为这种思想暗示政府应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②应提及的是,直到 70 年代中期甚至更晚,英国才出现可与美国相比的普遍的右翼观念。但是,不管是大西洋的这一侧,还是那一侧,最终使新保守主义思想赢得听众和市场的,毕竟还是物质条件的变化——简而言之,即是滞胀的来临。通货膨胀和衰退的混合物是某种新东西,不易被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所解决。约从 7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西方经济条件恶化并不能恢复或回到某种“正常”状态,对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的普遍信心大多消失了。尤其是政府和管理经济和为了不断增长的社会服务提供资金中的貌似有益的作用

^① 参见 Moynihan(1969); Glazer(1971); Kristol(1971)。关于社会政策的概念,参见米什拉(R. Mishra):the American War on Poverty(1984: 58—60)。

^② 在这个方面, Nozick(1974)可能是最好的作者。

受到了直接攻击。这就是历史。^①

从本书的观点看,战后以来新凯恩斯主义正统观念仍未被新的——无论是右派、中间派、还是左派的正统观念所取代,并没有出现新的“解决”,甚至没有出现新的解决办法的任何迹象。相反,我们看到的局面是,不同的体制正以各种方式回应经济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英国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政府显然为他们的国家创造了一条新的道路——给予私人企业和市场更多的空间,减少政府在其经济和社会活动方面的范围。另一方面,在奥地利和瑞典出现了社会民主合作主义道路(为方便起见,将其称之为“社会—合作主义道路”),其主要特征是,在维持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的广泛共识基础之上,采取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相一致的行动。同时必须指出,这并不是新保守主义方式的一个新起点。约从60年代后期以来,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地在奉行社会合作主义道路。然而,直到凯恩斯主义崩溃和新右派复苏之后,这一特别道路对于管理福利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才开始变得更加显著。^②因此新保守主义和社会合作主义可以被视做是70年代及其以后针对福利资本主义的问题和困难的不同凡响的两种回应。如果把纯粹意识形态的对福利资本主义的问题的回应(即马克思主义)放在一边,则西方福利国家的情况可概括为以下几类。右翼是新保守主义的模式,他们大肆宣扬收缩社会福利的思想,依靠私人部门和市场力量来实现经济增长及提供各种人类服务,其目标是大幅度减少福利资本主义中的“福利”因素。从现实的而非纯理论的意义上说,左翼则是社会合作主义的模式,他们拒绝放弃战后福利国家的目标,特别是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

① 参见米什拉(R. Mishra, 1984: 第1和第2章)。

② 参见米什拉(R. Mishra, 1984: 第4章)。在那里,我讨论了“混合福利国家”的道路,并将之与战后英国典型的“变异福利国家”做了比较。

就社会福利来说,前者可能被描述为收缩战略(retrenching)和政策,而后者被说成是维持(maintaining)福利国家的战略。这两个极端可以被看做是一个连续体的两个端点;在这两个端点之间,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其他的福利国家可根据其目标和政策,被置于这个连续体之中的不同位置。的确,在过去 20 年中涌现出的种种与社会福利问题相关的思想与运动,跨越了左派—右派、公共—私人的划分。这些运动包括生态和其他形式的“后工业化的”以及女权主义的运动。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运动仍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福利政治不太相关。

然而,表示赞成福利思想(无论是收缩还是维持福利)是一回事,能成功地实施这一思想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因此里根政府在上台时承诺减少政府赤字,砍掉公共支出并最终平衡预算。但实际上,里根执政期间的预算赤字上涨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在英国也一样,撒切尔政府的到来也带来了社会支出的上升而不是下降。尽管新保守主义大肆宣扬私有化和收缩社会福利,在英美两国,普遍的社会公共福利的框架,特别是教育、健康和收入保障,基本上未受触动。另一方面,像瑞典和奥地利这样的社会合作主义政制,尽管坚持对国家福利负有集体责任的原则,在实践中也不得不减少社会支出,接受更高水平的失业。这些情况为一种新的趋同或是结构性强制的论点提供了相当的支持。这一论点认为,尽管右翼喧嚣一时,但福利国家已不可逆转。^①那么,就福利国家而言,新右派是不是叫嚷得厉害而行动得少呢?如果是这样,由于同样的原因,即在各个政府举起的不同的意识形态旗帜之下,社会福利的现实仍几乎是一样的,所以社会合作主义的重要性也受到削弱。这是一个重要的论点。本书的一个主要兴趣就在于,根据处于新

^① 参见米什拉(R. Mishra, 1984),这里讨论了新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问题,见第 5 章,对福利国家的概念也做了讨论。

保守主义统治下的美国和英国、以及处于社会合作主义统治下的瑞典和奥地利的政策及后来考察这一观点。上述这两组国家可被视做我们已确定的这两种相对立道路的最应受到重视的典型。同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将被作为这两个政策“俱乐部”的候选成员而受到考察。

在加拿大,进步保守党 1984 年以压倒性多数票当权。一旦执掌政权,新政府在社会福利上表现出明确的新保守主义道路倾向。然而,面对强烈的抗议,政府退却了。这是支持福利国家“不可逆转性”的论断呢,还是证明加拿大正在实施逐渐收缩福利的战略呢?这个问题假定,1988 年使保守党开始第二任期的选举及随后与美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大约在加拿大选出一个保守政府的一年以前,澳大利亚朝另一个方向移动。在澳大利亚,工党上台执政,其经济和社会战略是建立在工会的“协定”(Accord)和三方合作(tripartite)道路之上,即把战略建立在一种社会合作主义的形式之上。实际上,英国工党政府也曾致力于与此相似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而这一契约无可挽回的破裂导致撒切尔夫人在选举中大获全胜。^① 鉴于社会合作主义道路在英国的失败,澳大利亚用其作为协调福利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基础的尝试,就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在写作本书之时,澳大利亚的协定仍有效。与撒切尔的记录相似,澳大利亚工党政府现在也处于其第三任期。澳大利亚的社会合作主义是否已成功?澳大利亚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采取了哪些政策,其后果如何?澳大利亚的经验支持这一论点(即社会合作主义提供了保护福利国家的有效手段)吗?简而言之,在四个“核心”国家之外的新保守主义和社会合作主义的传播与动作也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尤其从社会福利在英语国家的思想与实践的角度来看

^① 参见 Krieger(1986: 5—11, 44—52)。

更是如此。

无疑,新保守主义和社会合作主义政制的社会福利制度与实践在许多方面很相似。但本书的兴趣更多地在于它们的不同之处。这一兴趣不仅源于价值上的,也源于理论上的立场。更概括地说,这是一种反对各种类型的决定主义、支持选择和变化的可能性的态度。很久以来,在战后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历史中,这种或那种关于社会发展的全球决定主义(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占据着中心位置。可以取得的变更、选择和选择权,即使是在一定限度之内,基本上也都被贬低。但特别是从社会福利的立场出发,这些区别,其意义却十分重大,因为政策选择对于个人的福利具有相当直接和深远的价值含意。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范式的瓦解告诉我们,变化具有可能性,在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组织中也存在着选择和变化的可能性。这是右派“反革命”强烈想使人们接受的一个教训。但是,应允许什么类型的选择与变化呢?从本书的观点看,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所考察的政策回应与模型(新保守主义和社会合作主义)和我们所考察的国家,可以统统被看做是与社会福利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未来相关的诸多社会实验。新保守主义在经济和社会福利问题上对经济增长、高劳动生产率和自主创新做出了承诺,他们果真能如愿以偿并越来越吸引选民与国家吗?如果新保守主义获胜,这是因为它能兑现诺言还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其他的选择呢?或者,像瑞典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凭借其将经济与社会政策问题紧密相连、谋求找到一种三方合作的决策形式的整合方法,这样就能提供一种可能保持或是巩固战后福利国家本质的有吸引力的框架吗?或者,事实是否将再次证明,正如“不可逆转性”论点所暗示的那样,除小的损坏和修补之外,福利国家的结构实际上并未受到触动呢?这些问题既有实践意义又有理论意义,各国的种种实验也许具有远远超越其国界的重要性。从中有许多“教训”可以吸取。

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政策的制定和选择是离不开一个民族国家的具体环境的。尽管像马克思和蒂特马斯(Titmuss)这些在时间和理论观点上都相距甚远的社会科学家都认为国家能够并应该吸取彼此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但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即民族国家的历史特征是坚决抵制文化和制度上的变革，从而形成其孤立性。而且，在历史的连续性中，一个民族国家的制度和文化的构造势必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问题”的本质。出于同样的原因，这种不同的结构和文化构造使特定的变化和方向比别的更为可行。即使如此，社会组织的一般模型仍有几个用处。一方面它们具有一种“示范效应”，即它们表明某种社会安排是可行的，因此原则上在任何条件下都适用于所有国家。另一方面，它们的历史存在和那些或多或少初见成效的功能，导致了对于构成现状的那些社会安排的批评态度，或至少导致产生了一种可供比较的参考框架。^①

比较意味着评估，并随之显示出选择和变化的可能性。社会福利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扩散的事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俾斯麦式(Bismarck)的社会保险措施不仅在欧洲，在美国也具有相当的“示范效应”。无论集权主义的德意志国家与英美的自由民主政体在政治上多么迥然不同，俾斯麦的社会保险计划的先锋影响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它的扩散，无疑是循序渐进的，但它显然具有值得吸取的经验，而且在政治与文化上与德国非常不同的国家也吸取了这些经验^②。距离现在更近的时候，凯恩斯—贝弗里奇福利国家在战后英国的出现，至少在说英语的国家中也有“示范效应”，尽管从其综合性、制度特征和效果看，这是一种独特的英国现

① 关于这些论点，参见 Higgins(1981：第2章)和 Jones(1985：第1章)。

② 参见 Briggs(1967：33)；Gilbert(1966：231，291—3)；Lubove(1968：4—8，55，56，66—7)。关于对社会保险的传播的进一步评价，还可参见 Kuhnle(1981：126—31)。

象。很明显,这些影响经常是间接性的。“扩散”并不仅是完全的制度进口。于是,贝弗里奇报告(the Beveridge Report)引发了加拿大的马什报告(the Marsh Report),这一报告可以被说成是加拿大福利国家的蓝图。但加拿大用了 20 多年时间才将马什报告中主要的建议转化为社会福利政策。^① 现在看来制订政策的新保守主义和社会合作主义方法可能就是扩散的某种形式。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根据它们的政策及后果比较这两种方法。

在 70 年代的经济危机对不同民族国家的影响这一案例中,我们强调了在一般模型与民族国家的独特性之间的、令人感兴趣的、辩证法的问题。的确,作为一个经济系统,资本主义是一种国际的或跨国的现象。谈到资本主义的“危机”,可以说它是这样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运作范围是世界性的,其问题从性质上说具有普遍性(如失业、利润下降、高利率、通货膨胀等等)。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质和危机在各个民族、国家背景中的特性也同样显而易见。当然,民族、国家背景不仅简单地指经济,也包括政体,即一个民族、国家内的态度、价值观和制度。同时期的和不同时期期的因素都包含在内。

一个国家有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历史。在任何既定的时刻,国家也有一套制度来规范生产和分配,管理冲突,制定社会决策和维护社会价值观。因此资本主义“危机”以具体的不同的形式,在民族国家历史和发展轨迹的不同时期对它们产生了影响。以英国为例,与工业化国家的普遍水平比较,战后几十年英国的经济增长缓慢。60 年代出现了大量关于国家状况的书和几乎是持续不断的辩论。相对而言,英国处于经济衰落之中。60 年代末,加入欧共体(EEC)看来是可能制止经济下滑的一个办法,但那也没有能治愈“英国病”。因此,70 年代中期当经济衰退袭击了其他资本主

^① Guest(1985: 第 8 章); Kitchen(1986: 33—48)。

义国家时,英国已经历了长期的经济衰落。持续的经济停滞、工党政府与工会之间“社会契约”的失败,均以“不满的冬天”而告终。恶性通货膨胀、劳资冲突,尤其是不能就危机治理和经济复苏形成有效的国家共识,是英国人最终转向激进的保守主义——撒切尔主义的背景。^①

加拿大则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反例。相对而言,50、60年代加拿大的经济增长是健康的。通货膨胀在70年代仅勉强达两位数(见附录2表3)。与联合王国相比,加拿大的工会和劳工运动一直微弱得多。^②所以毫不令人惊讶,加拿大人可以接受比英国高得多的失业率,并因此而创造了十分宽松、而不是过紧的劳动力市场。加拿大政府也发现命令罢工工人回去工作或规定法定工资限制等要相对容易一些。^③而且,加拿大经济在70年代后半期增长十分健康,直到80年代初期,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才涨到两位数,国民收入呈负增长(见附录2表1—3)。很明显,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情况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性质和严重性在各国也不同。“危机”在各个国家的性质与过程是一系列主客观变量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以致于危机的“原因”与“影响”迅速地、不断地交换位置,而这一过程也不得不被看做在本质上是基本充满活力的。本章在后面将探究这些问题。

为了解解7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每个国家对它不同的回应,我们已集中在一对相对立的政策观念上。不用说,这些政策观念并不是脱离了价值观的。各种政策回应远不只是对付危机的技术上的策略,它们都代表着特定的价值选择,支持某种集团利益。通过

① Krieger(1986); Gwyn & Rose (1980).

② 例如,关于工会会员,左翼投票和左翼政府,参见 Korpi (1980: 307—8); Stephens (1979: 115—18)。

③ Panitch 和 Swartz (1985)。

考察这些政策模型的性质及它们产生出的结果,我们可能会增强“吸取教训”的能力(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将部分地取决于我们所在的阶级和国家)。然而,吸取教训并不只是评价某种方法的效果,它的可行性也很重要。举一个社会福利领域以外的例子,日本劳资关系的终身雇佣的体系虽然效用很强,但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立场来看,可行性似乎很小。所以,可行性即指可能性,指在其他国家也可以运用的某种模式的前提条件。这两个模式的文化、政治和制度前提的问题,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尽管在我们的探究过程中将会涉及到这些。^①

上文已概括性地指出了我们想要探究的问题——70年代对福利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政策反应。下面我们将要提出一些在分析中使用到的思想、概念和解释框架,亦即理论的内容。在别处我已指出了一种分析当代福利国家的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运用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②以下的分析就建立在这一方法的基础之上。

一、社会系统:结构和机构

上文提到,我们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分析福利资本主义对经济危机的不同反应。每个民族国家将被看做一个社会系统,即一个由制度与集团共同形成的相对具有凝聚力的整体。这并不是赞同社会的共识(*consensus*)观。在冲突继续的同时,正如在分配和规范等问题上存在冲突那样,同时也存在着合作(*cooperation*),通过合作能使社会必需的功能得到实现,例如生产商品与服务、通过立法机关制定社会决策等。重要的是,不应把社会视为完全冲

^① 对三方合作主义与合作主义的前提条件的讨论,参见 Maier(1984)和 Banting(1986)。这里的讨论不涉及价值自由问题,也不涉及政策实施问题,主要目的是理解和解释当代福利国家的本质。“吸取教训”的目的是为了选择政策及后果,意味着善待政策。

^② 米什拉(R. Mishra, 1986)。



突的社会,或把社会看做是完全和睦的社会,抑或用共同的价值观将其捆在一起;应该说,社会是一个冲突与合作(cooperation)共存的舞台。此外,冲突与和谐的对立太过于集中在集团与集团的关系上(如社会阶级及其冲突),而忽略了代表各集团共同利益的社会的功能范畴和制度范畴。因此“国家利益”这个术语是完全合法的。假定民族国家现有的各个民族和经济组织的生活水平极为不同,那么,特定国家的国民仍可在保持竞争力、效率和高水平的物质生产等方面找到共同的目标。如果说分配问题倾向于分化,那么,生产问题就倾向于使阶级和集团统一起来,以保卫其作为国家一部分的地位。总的来说,福利国家是建立在积极肯定的阶级集团关系和维持这一关系的基础之上。

然而,社会不仅包括阶级和社会集团,还包括制度秩序。这些制度秩序可以被看做是建立在一定基本原则和价值基础之上以期达到特定目标的行动方式,例如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军事秩序、教育秩序、社会福利等。这些部门中的每一个都可能具有内在的功能不良或矛盾,能引起不均衡和不稳定。从资本主义经济仅仅只由市场机制来协调,而且市场机制又易于被国际影响和压力所冲击(在易受国际冲击这方面,经济完全不同于其他的制度秩序)的意义上说,私人占有的、利润驱动的、建立在市场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结构性的不均衡。因此经济就被繁荣与衰退、周期性的大规模失业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所折磨。这些问题并不必然也并不主要是诸如劳动(工人)和资本(所有者)集团为分配“馅饼”而产生的冲突。相反,它更是由经济基本的多元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性质而导致的失衡和功能不良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种不均衡与不和谐被称作“矛盾”。

矛盾可能发生于一种制度秩序(如经济)内部,或者就不同秩序建立在不同的社会原则之上,并由此可能有相反的目的而论,矛盾也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制度秩序之间(如经济与政权)。例如,资



本主义社会的两种制度秩序,市场经济与民主政体就有很不一样的目标,建立在很不一样的原则之上。这就是一个潜在的冲突来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谋求通过竞争使效率和利润最大化。这样做,它就奖励效率高的而惩罚效率低的人。它使经济成为一种不平等,并由此而成为非道德的系统。同时经济也倾向于超国家性质,这是一个具有极大的、持续的、重要意义的特征。另一方面,政治秩序牢牢地扎根于民族国家之中,并建立在公民平等参与(一人一票)和“代议制”政府的原则之上。它可能追求诸如社会安全、公正和环境安全等国民关切的目标。这可能要求采取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相反的措施,如充分就业、最低工资、以及关于污染和职业健康与安全的社会最低限度与规定等。因此,经济体制影响政体所赞同的原则与价值,而反过来政体发布的规定又冲击了经济体制的运作,于是,这就成为资本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也许是所有工业化社会的重大问题)。协调经济与社会目标看来是所有现代工业化经济的一个重大任务。

在民主政体本身内部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例如公民作为选举人和纳税人的角色就是一对矛盾。作为选举人和消费者,公民可能期望和要求政府给予他们大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而同时,作为纳税人和利益集团的成员,他们表现得“自私”,不愿给政府满足他们作为选举人和消费者所需的各种支持(如愿意付税、接受技术和社会变化、缓和其坚持工资要求的立场等)。政治系统中的需求和供给也不容易平衡,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的相互冲突的态度与行为也能被看做是“矛盾”的。当然,福利国家(充分就业与高水平的社会支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的、易于变化和追逐利润)之间的矛盾才是新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福利资本主义的批评的核心内容。^① 在这一背景下,重要的在于制度

^① 米什拉(R. Mishra, 1984: 第2—3章); Gough(1979: 第6—7章)。